

一二九立秋名湖畔

北京出版社

一二九立未名湖畔

赵荣声 周 游 编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二·九”在未名湖畔

Yierjiu zai Weiminghupan

赵荣声 周游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78,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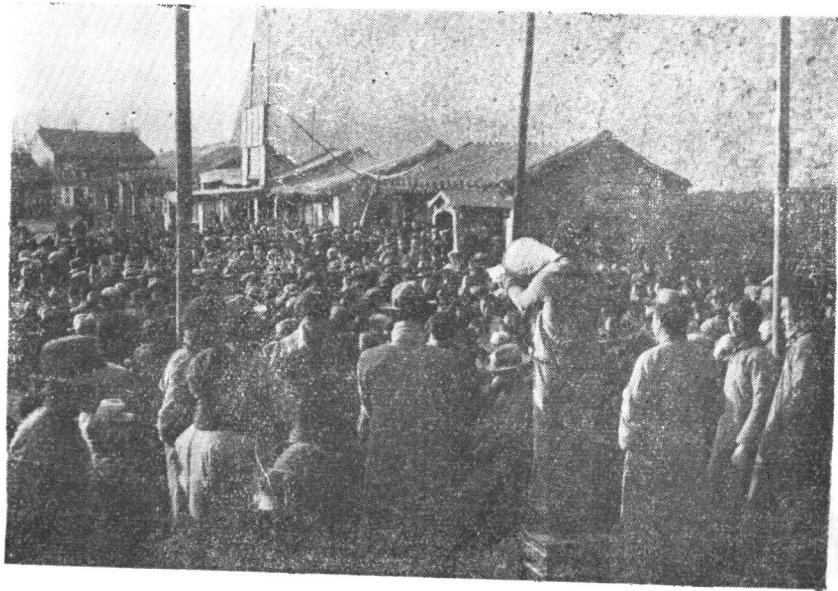
印数：1—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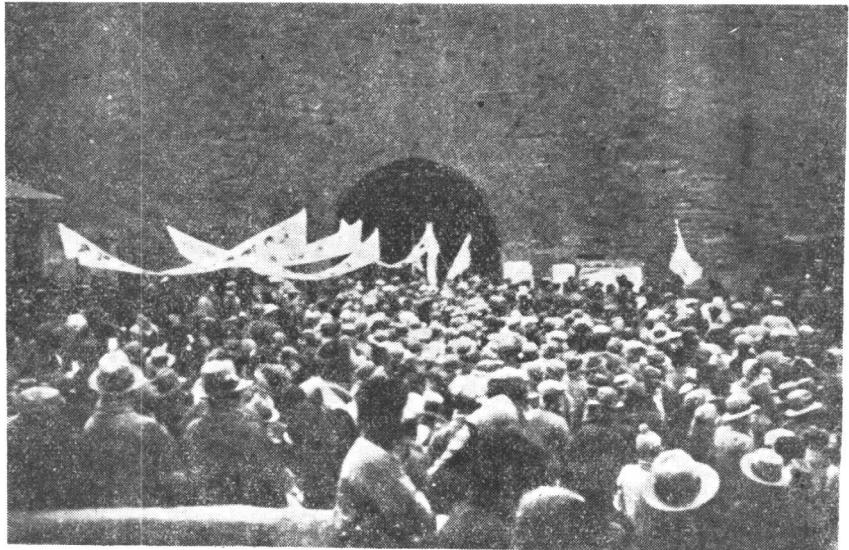
书号：11071·477 定价：1.25元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图为燕京大学的队伍向西直门方向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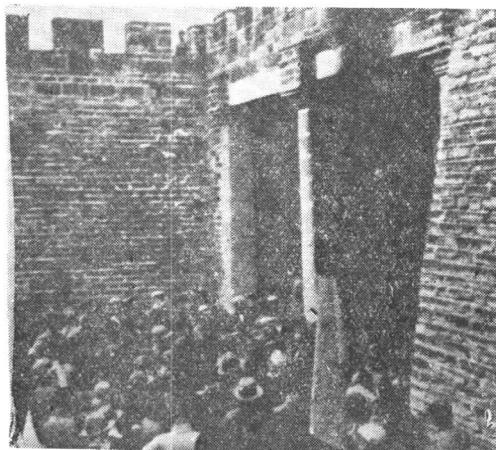
国民党军警紧闭西直门，西郊各校学生在城外开群众大会。图中拿话筒讲话者为清华大学学生陆璀，其右戴呢帽者为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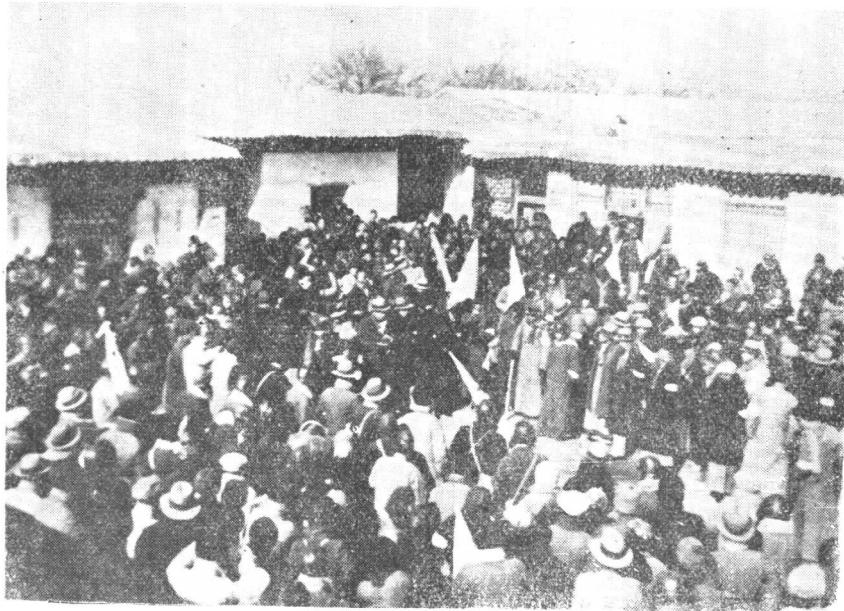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爱国学生再次示威游行，西郊各大学的队伍又被阻于西直门外（上图）。他们又到西便门，终于冲开了西便门（左下图）。

燕大宣传团在河北涿县向老乡表演短剧《打回老家去》（右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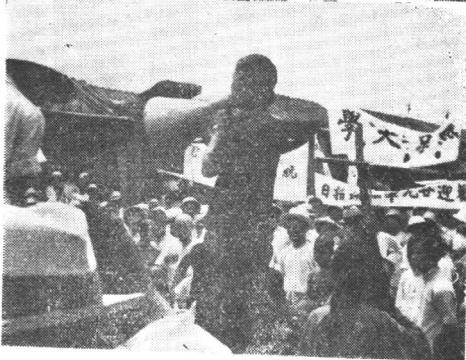


南下扩大宣传团四个团会合在河北固安县开全体大会。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第二大队(燕京大学)第三小队合影。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第四次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增兵华北，欢迎二十九军抗日。右两图为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一九三七年四月，燕京大学学生访问团到达延安。下图为访问团在延安的留影。



目 录

- “一二·九”五十周年有感 张兆麟 (1)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会革命 黄 华 (5)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 陈翰伯 (36)
- “一二·九”时期燕大党和革命组织的建立
..... 王永祺 (73)
- “一二·九”运动中的对外联络工作 龚普生 (77)
- “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雷洁琼 (86)
- “一二·九”这一天的回忆 侯仁之 (91)
-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比利时的中国
学生的爱国活动 韩素音 (95)
- “一二·九”运动的几幕回忆 杨文泉 (99)
- “一二·九”运动中的基督教学生 张淑义 (103)
- “一二·九”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 周 游 (112)
- “一二·九”运动中的普通一兵 汪 溪 (120)
- 扩大宣传日记 赵志莹遗作 (129)
- “二·七”南口宣传记 陈 龙 (136)
- 回忆“六·一三”示威游行 张德华 (140)
- 回忆援绥劳军和赴京请愿 朱煮谱 (144)
- 记燕大新闻系绥远前线战地调查团 陈封雄 (151)

第一个到延安的北平学生访问团

- 赵荣声 柯 华 陈 龙 王向立 (156)
朱劭天 斯 明 李 执 郑怀之
到卢沟桥慰劳抗日驻军 朱劭天 (165)

- “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 赵荣声 (173)
“一二·九”文学回忆 程应镠 (184)
狂飙剧社的演出 陈鼎文 (190)
救亡歌声响彻未名湖 朱哲均 (195)
海淀的女工教育工作 倪 冰 斯 明 (200)
燕大民先的“大本营” 石 方 (204)

- 在斯诺的小客厅里 陈翰伯 (212)
愿佩格·斯诺重来未名湖畔 李 慾 (224)
缅怀敬爱的夏仁德教授 李 慝 (230)
忆赵宗复同志 刘 柯 (234)
洒泪记龚澎 柯 华 (238)
勇敢的播火者朱南华同志
..... 李植清 朱煮谱 张德华 (244)
我深深地怀念着志萱同志 倪 冰 (248)
怀念为理想献身的康英同志 梁思懿 (252)
悼念天蓝同志 周 游 (256)

附录：《队长骑马去了》的诞生经过

——天蓝同志一夕谈

- 唐天然 (259)

“一二·九”五十周年有感

张兆麐

“一二·九”五十周年来到了，感触万端，觉得应该写点东西。“一二·九”运动掀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哺育了整整一代青年。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正是通过参加“一二·九”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平同志说得好，青年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们当年的理想和抱负，用几句话来概括，就是赶走侵略者，全民族得解放，建设新中国。以后许多人便走上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作为自己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作为推动自己不断克服困难和奋发向上的动力。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许多人已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二·九”运动爆发前，我被同学们选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和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陈絜等同学共同负责燕大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这时学生会的领导权已掌握在进步同学手里。一九三五年秋新生入学时，这些从四面八方到燕大来的同学，中间确有不少充满朝气、思想进步的分子，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的组织才能。他们很快就团结在学生会的周围，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同学中这些优秀分子不久还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秘密的燕大党支部的领导下，其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燕大分

队，很快就团结了广大进步同学。“一二·九”运动在燕京大学中搞得很猛烈，决不是偶然的。

“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几所大学首先发动的，东北大学和清华先有党组织，应该说他们对燕大的帮助很大。东大同学一直是国民党当局打击的重点，但他们从不气馁，真有一股百折不挠的精神。为帮助燕大组织军事演习，东大曾借给我们一批武器，并派专人来进行指导。东大的中共党支部成立的比较早，有些同学懂得马列主义也比我早，“一二·九”以前我的思想提高受到东北大学一些朋友的启发最多。清华是我们的邻校，这两个学校的学生一贯密切往来，共同战斗。《八一宣言》就是由他们转给我们的，我参加共产党，也是陈毅同志带领我到清华蒋南翔同志那里举行入党仪式的。今天回忆“一二·九”运动，首先要向这两个学校的老战友们致敬。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一二·九”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成功的群众运动。历次群众运动总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一二·九”运动却不但未被镇压下去，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客观条件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在主观上我党策略与政策的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入人心，争取到了中上层社会的同情，利用了宋哲元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做得比较成功的。通过群众运动来训练和壮大自己的队伍，也是“一二·九”运动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学生罢课以后，不失时机地筹备和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同学们响应北平学联到农村去的号召，一方面可使抗日宣传深入农村，另一方面对同学们本身也是

一个锻炼。广大知识分子过去对农民的疾苦基本上是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而如果不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沉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所谓“抗日”岂非成了一句空话。通过这次南下宣传，初步帮助同学们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不能说不是一大收获。南下宣传的另一重要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要把群众运动坚持下去，有必要在进步同学的优秀分子中成立一个骨干组织，民先就是这样的组织。以后的实践证明，作为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民先也确实起到了团结广大同学的作用。

斯诺曾在燕大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我那时是新闻系学生，首先和他有来往，我带了进步同学到他家去谈，越带越多，越谈越深，斯诺虽然也是一个西方记者，但和其他许多西方记者完全不同。他富有正义感，对德意法西斯分子的残暴行为十分憎恨，对日本侵略者的所作所为更是深恶痛绝，而对世界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对灾难深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则充满了同情。他对我国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同情，一直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和比较后，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希望。我们常到他家去聚谈，把所知道的一些各地抗日活动的情况告诉他。现在“一二·九”的五十年纪念日到了，我们不能不深切地怀念他。

“一二·九”的影响到达全国许多地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一二·九”运动对于西安事变也有明显的关系。“一二·九”的政治口号为张学良所接受，“一二·九”的运动曾经引起张学良的重视，他这时已认识到蒋介石

“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不得人心，不愿再为蒋火中取栗。“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即任用东北大学学生领袖宋黎同志，宋黎同志又引进许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同学，帮他做了各种工作。我自己也是东北籍的流亡学生，一九三六年夏季在燕大毕业，也由宋黎同志介绍到西安投入张学良的部下，担任《西京民报》社长，在西安事变当中做了一些工作。这是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伸延，现在回想起来，心情还非常激动。

总之，“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除了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对全国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民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还为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提供了斗争经验，还确实为我党迎接抗日战争培养了、准备了一大批干部。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同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成为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批很重要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在战争期间光荣牺牲的这一部分外，剩下来的基本上已成了我党在各个地区的重要骨干。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时，回忆往事，提供史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张兆馨现名张兆林)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 学会革命

黄 华

一、华北垂危，要求抗日

一九三一年，我原在锦州交通大学预科学习，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沈阳，我随着学校入关，来到北平。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受漂泊流浪的痛苦，要求收复东北，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打回老家去的心情非常强烈。我的爱国思想也和他们一样。我在家乡读初中时，参加过反对济南惨案的活动，看过《狂人日记》和党的一些传单。我于一九二八年在河南读高中时，已从当时出版的刊物如《语丝》、《奔流》、《莽原》上零星地接触了进步思想。一九二九年到锦州交大预科学习，那时东北一般学生一方面不满日本窥伺东北，滋长着爱国主义思想；一方面又受东北当局利用中东路事件煽起反苏反共宣传的毒害，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情绪随之增长。我躲开人们的注意，读了自己带去的梅林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使我从反帝爱国思想开始要求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要求深入认识中国社会。所以我到北平之后，即常常到书摊上去寻找进步书籍，看过李达的唯物辩证法，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鲁迅抨击国民党的杂文和其他一些进步杂志，使我初步

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意义，痛恨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向往社会主义，向往苏联。

一九三二年即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年的秋天，我考入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在这个学系的小图书馆中，有英文本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列宁主义基础》，这是当时很不容易见到的书籍，我详细阅读了，并把其中要点译成中文，拿给东北大学里我熟识的朋友们看。这些老朋友就是宋黎、张希尧、张金辉以及进步教师车向忱，还有和我同时考入燕京大学的东北籍同学张兆馨。我们这些人思想接近，往来密切，不但在一起讨论思想进步的书，更多的还是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从国际谈到国内。我刚在燕大读了一个学期，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继侵占东北之后又复沿着北宁铁路西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突破长城上各个口子，华北门户大开，日军随时可以拿下平津，关内人心惶惶，在优美安静校园中读书的燕京大学学生也受到震动。燕大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的，但是习惯于埋头读书，其中，对时局麻木不仁、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也还不少。校内进步同学们组织了全校学生抗日会，要求政府抗日，并在校内掀起抗日热潮，使同学们对于日本入侵华北产生紧迫感，我也积极参加学生抗日会的活动。

我曾经利用比较自由的燕京印刷所帮张希尧翻印过关于游击战术的小册子。燕大抗日会领导全校学生举行过一次抗日军事演习，我利用自己和东北大学同学的关系，得到东北大学军训教官的应允，从该校借来一批武器。当时北平有城墙，各个城门都有检查哨，不允许携带武器出入。那一天我借了学校开班车用的大轿车开到东北大学，从仓库取出一

批轻机枪、步枪、手榴弹放在车座椅底下，开出了西直门，警察问明是燕大校车，便放行了。演习时在西校门挖了壕沟，在学校的水塔上放信号，燃放鞭炮，真刀真枪，这次演习的真情实感，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日热情。燕大同学中抗日热情一直很高，历年的爱国救亡运动曾经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多少有些影响。

为了自己将来和日寇战斗作准备，张希尧还教我制作手榴弹，那是用一个香烟罐子装上炸药和碎玻璃等物，拿到圆明园一个荒凉无人的土堆上试放，向远处投掷过去，发出很大的爆炸响声。

一九三三年我和张兆麐、刘克夷、叶德光等十余同学在校内组织了一个小型抗日团体叫刻苦团，提倡生活刻苦、锻炼身体，准备日后参加东北义勇军打游击。这个点子是从东北大学抗日救国会学来的，他们有类似刻苦团的组织。燕大刻苦团平时不进城不看电影，早晨起来作体操，穿蓝布大褂，吃最粗糙低廉的饭食，在生活上抱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并且学习进步思想理论，这对于我后来参加革命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番锻炼。

二、“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

毛泽东同志对于“一二·九”运动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也有个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

过程。

北平学生运动能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并且能够健康地持久地发展下去，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东北沦陷、华北五省自治、平津危在旦夕的政治形势，激起了有光荣传统的北方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潮。学生运动在北平原先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行动中，队伍一直在扩大，许多学生自发地来参加游行活动。第二是党的《八一宣言》，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北平地下党和党员以及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在学生中进行活动，象酵母一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促成了北平学生运动从半自发的状态走上有组织、有目标、有纲领的抗日救国行动。第三，北平学生运动来势迅猛，这是由于党在全国的工作。党和爱国人士一直长期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不但北平连续发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和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等活动，在全国各大学和爱国人士中也迅速开展了抗日救国的斗争。第四，学生运动能够持久的发展下去，直到抗日战争大批学生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入敌后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是党中央派遣刘少奇同志到了北方，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及时地指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过“左”倾向和过激行动，提出一些很重要的策略，包括统一战线思想，争取宋哲元部队抗日的思想，这样就使北平学生运动能够争取到许多校长和教授的同情，也得到了宋哲元的谅解，因而才能持久地坚持下去，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活动，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大批学生和各界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赴延安，接受革命政治军